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徐有富 徐昕 著

文献学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研究/徐有富,徐昕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3

ISBN 7-80643-704-5

I. 文... II. ①徐...②徐... III. 古文献学—文集
IV. 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870 号

文献学研究

著 作 者 徐有富 徐 昕 著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1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704-5/K·201

定 价 21.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我1962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下学期裴显生教授为我们开评论习作课,要我们完成一篇作业。当时学习《毛主席诗词》蔚然成风,恰好系资料室编了本《毛主席诗词论文索引》,我花一角钱买了一本,根据该索引提供的线索,找资料来看,写了篇《学习毛主席诗词笔记》交了上去,想不到裴老师看了很高兴,写了一段长长的批语给予鼓励,其中谈到:“作为‘评论习作’的作业,我仍认为这是一篇有份量的作业。我希望您今后能继续进行这一工作,写成比较成熟的文章。有些具体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以后您若有空,请您来我家,咱们好好地谈一次。”老师连用了好几个“您”字,真使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我刚尝到一点从目录学入手问学的甜头,遗憾的是,我们很快就被卷入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到湖北的一座矿山,先是当井下工人,后来在矿山的子弟学校当中学老师,一晃就是十多年。这期间我也挣扎着写过《诗歌泛谈》的稿子,而且也请裴老师帮我看,裴老师仔细地看了两遍,为我写了三千多字的批语。除师长为学生写的鼓励的话外,主要都是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实在没有条件像老师们所希望的那样,将我的稿子写得比较成熟一点。

直到1979年,我有幸成为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才真的与文献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程先生治学主张两点论,即文艺学加文献

学。他在对研究生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工作的目的，研究的最高希望就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这要求一方面要有比较深刻的美学艺术修养，其中包括创作经验在内；另一方面要有深厚的文献学知识，要懂得版本、目录，要懂得音韵、训诂，还要懂风俗、制度等。”所以他特地为我们开了校雠学（即文献学）和中文工具书使用法两门课。校雠学的课程论文就是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心得体会。接下来如程千帆在《校雠广义叙录》中所说：“徐有富同志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国钧）、汪（辟疆）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并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他了。”我们花了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聊以自慰的是这部著作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其中《版本编》还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四编都分别获得过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或三等奖。

此外，我在教学与写书之余，也发表了一些文献学论文，现结集在这里，仿太老师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之例，取名为《文献学研究》，算作晚交给程千帆先生的一份校雠学作业，可惜他已来不及看到了。这本书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介绍文献学基础知识，算作文献学入门吧，另一部分为文献学专题研究论文。徐昕同志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任职于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所写文献学论文颇有参考价值，也一并收在这里。我还打算采用文艺学与文献学紧密结合的方法写一本诗学研究方面的书，以报答裴显生、王兆衡等本科阶段的老师对我的厚爱。是为序。

徐有富

2001年6月26日

目 次

以文献学为基础

程千帆先生谈治学·····	(1)
程千帆与《校雠广义》·····	(4)
程门求学记·····	(9)
谈谈写读书笔记·····	(12)

走进文献学

谈谈古籍目录·····	(15)
谈谈古籍版本·····	(18)
谈谈古籍校勘·····	(21)
谈谈古书的辨伪·····	(24)
谈谈古书的辑佚·····	(27)
谈谈方志·····	(30)
中国类书与《中华大典》·····	(33)

文献出版

先唐别集考述·····	(36)
辽代文献的发现与书史研究·····	(49)
论南京国子监刻本·····	(55)

论毛晋的出版事业	(68)
论黄丕烈的出版成就	(78)
办理《四库全书》组织管理工作述要	(87)
论李光明庄的出版事业	(99)
论古代贩书目录	(116)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学术著作	(129)

文献编目

对目录学定义的再认识	(137)
影响中国古代目录分类的若干因素	(147)
古书名浅谈	(157)
牌记浅谈	(164)
目录对古籍版本的记录	(170)
论《汉书·艺文志》附注的价值(徐昕)	(181)
影响较大的私家目录是《七录》而非《七志》	(192)
尤袤与《遂初堂书目》(徐昕)	(197)
论清高宗的目录学思想	(206)
谈谈《经籍举要》	(214)
李小缘目录学思想初探	(223)

文献收集

试论陆游的藏书题跋(徐昕)	(231)
状元藏书家焦竑(徐昕)	(241)
从藏书印看明清藏书家的藏书观(徐昕)	(248)
试论祁承燾的藏书理论与实践(徐昕)	(254)
论黄丕烈的藏书特色	(266)

试论丁丙鉴定图书价值的方法(徐昕)·····	(275)
——读《善本书室藏书志》	
柳诒徵与国学图书馆(徐昕)·····	(288)
对读者应具摩顶放踵精神·····	(297)
——读李小缘先生图书馆学论著札记	

文献评价

关于书评的思考

——读《书评工作指导与探索》札记·····	(307)
读《郑樵诗辨妄辑本》·····	(321)
试论钱大昕的版本学成就·····	(330)
校勘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读《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	(338)
完善一代史志目录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355)
读《中文工具书教程》(徐昕)·····	(365)

以文献学为基础

程千帆先生谈治学

1999年11月31日上午,我和三位博士生拜访了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了治学方法,特记录整理如下:

你们考取了博士生,说明你们对专业有信心,想学好。

要学好文学,一方面要注重文学理论,一方面要注重材料;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文艺学,一方面要注意文献学。文艺学能使我们看问题看得深,文献学能使我们看问题很具体、很扎实。

硕士生阶段学习,可能有所侧重,或侧重于文艺学,或侧重于文献学,但两方面都得注重。我一开始注重文献学,我和徐老师合写了《校雠广义》,他花了十年时间,我花了六十年时间,现在得了国家图书奖。

文艺学与文献学两者有个结合点,那就是作品,首先要把作品弄得很清楚。作品是用心写的,我们读作品往往被心激动,这是心被心激动。

如果没有具体材料,不了解产生作品的那个时代,那你也就不易理解其作品。譬如不了解安史之乱,就不易了解杜甫的作品;不了解屈原的处境,就不易了解屈原的作品。读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想些什么。

攻读博士学位要选一个很好的题目,我在南大指导十位博士生,他们的毕业论文基本上已经出版了。徐老师岁数大了,没有读博士生,但是他很用功,现在已具备了博士生导师的水平。选一个好的题目,在三年之内写一篇论文就很不错了。

一个是文艺学修养,一个是文献学修养。首先要把作品读懂,譬如《长恨歌》,白居易一开始采取了谴责的态度:“汉皇重色思倾国。”后来又转为同情:“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是由诗人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认识所决定的,唐玄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儿媳张良娣对他很不好,这就是生活的力量。

学文学的人对作品要有很强的感应。我八十多岁了,读作品还经常受到感动,一个人流泪。这是心灵感应。

学文学的人,自己应当能够写作品,如果完全不写,就会对文学作品不亲。读作品,同时自己也学着写一点作品。我们读大学时,有些老师要求我们写诗,如吴梅出的一个题目就是《金陵咏古十首》。如果能搞点创作,我想是非常之好的。

南京大学学风很好,师兄弟一方面很团结,一方面又很竞争。一个人一两年不出一本书,自己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学生很用功,所以我也不敢偷懒。

由博到约是相对的。余嘉锡很博。我对杜甫、苏东坡熟悉一些,写过书,对李白只写过一些论文。周勋初专门研究李白。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了上卷,不是没有时间写下卷,而是他的思维不能贯穿全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超过了他。尽可能求

博,尽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就说明他什么都不知道。

程千帆与《校讎广义》

程千帆先生于1932年8月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当时南京的高等学府大师云集,所开设的课程也非常多,作为一名新生,他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学什么?怎么学?他带着这些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们的回答也不一样。黄侃先生说首先要通章句之学,要先把书读懂读通。刘国钧先生说先要通目录之学,治学就容易摸着门径了。刘国钧讲目录学兼及版本、校勘,事实上即校讎学。程千帆在师从刘国钧的同时,也常向汪辟疆老师请教校讎学方面的问题,逐渐对这门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也接受奉行了治学应从校讎学入手的观点。

1934年秋天,程千帆跟刘国钧学目录学,写了一篇题为《〈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课程论文,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的分类标准,作了合理的说明。此文发表于1935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2卷第1期。这是程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他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为了巩固自己的学习成果,程先生于1934至1937年间连续撰写了好几篇校讎学论文。其中有6篇后来收在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的《目录学丛考》中。程先生家境清贫,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甚至连袜子都没有穿的。他在1938年写的一首诗中,记录了他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钻研校讎学的情形:“恒情恶贫贱,得饱更求馀。吾亦常苦贫,而不乐簪裾。撑肠借旧业,发篋著我书。注杜称千家,幽闷烦爬梳。孳

孳事目录,琐琐及虫鱼。”

1942年秋天,程先生在四川成都就母校金陵大学之聘,刘国钧仍担任着该校文学院院长,工作非常忙,得知程千帆还在继续钻研校雠学,并且计划写一部比较全面的书,就将这门功课的教学任务交给了他。于是程先生一边讲授,一边撰写《校雠广义》。对于刘国钧先生的教诲与知遇,程先生始终怀着感激之情,直到晚年还写了《上衡如先生》诗二首,其二云:“争关梦觉叹何曾,敬业传薪愧不能。未死白头门弟子,尚留孱魄感师承。”1945年,程先生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的课程中,仍然有这一门,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解放后进行教学改革,这门功课被取消了。随后程先生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近二十年,对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当然地无暇顾及了。

1978年,程先生受匡亚明校长之聘,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研究生需要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从十年浩劫中被抢夺、被焚烧、被撕毁、被践踏的残存书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雠广义》,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但因工作需要,仍然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志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跟程先生学过校雠学,所以承担了本科生目录学的教学任务。程先生像过去一样继续对我施加友善的压力,不仅将为研究生上校雠学的任务交给了我,而且还将与他合著《校雠广义》的任务也交给了我。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诚惶诚恐的事。我们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任务。当我们手捧着这部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130万字的《校雠广义》时,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愉快的感觉。

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指出：“根据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关于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只想就程先生为什么锲而不舍地撰写《校雠广义》，为什么特别重视校雠学的教学工作的问題，谈点粗浅体会。

首先，他想把钥匙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他说过：“多年来，学生多半注意接受老师们传授的知识，而不够注意学习老师们获得知识的方法。每位老师都有一个知识仓库，学生往往等老师将仓库打开，拎着口袋去装，而并不一定会想到应当自己去打开。研究生如果还不注意这一点，他们获得的知识终将是有限的。”所谓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在程先生看来就是校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录学。有位研究生曾经问他：“假如你现在年轻二三十岁或更多，你将如何着手？”他回答道：“假使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我还是首先注意从目录学入门。”为了把钥匙交给学生，他特地为学生开了校雠学、工具书使用法等课程。校雠学的作业是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论文；工具书使用法的作业是利用工具书所提供的线索为一篇古诗文做注释、校勘工作。在指导我们读专业文献时，他还特地为我们开了《专业文献选读书目》。我感到从目录学入手可以全面而迅速地了解文献信息，大开眼界，少走弯路。

其次，他要为学生今后治学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程先生认为“任何真正的科研，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收集材料的阶段”。“一般说来，凡是属于征集、排比这样一种工作，都可以称为收集材料的过程。比如说，给一个作家作年谱，或者把他的诗文按年来考订，或者是给一个古书作注解，作校勘，这一类的工作，都属于收集材料的阶段”。而校雠学或者说文献学的任务正是探讨收集、鉴别、整理材料的规律。我们如果要扎扎实实地做学

问,都应掌握丰富的文献学知识。

程先生文史兼治,在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数十年来,他的研究方法虽有发展变化,但始终将文献学作为基础。如早期,他在撰写《古典诗歌论丛》时,尝试着“把批评建立在通过考据而得出的坚实的材料的基础上”。而晚年,他在与研究生谈话时,则进一步指出:“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文学研究首先要有文献学作基础,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这才是唯物主义的 attitude。”只要我们翻阅程先生的论著,都会为他占有资料之详细,鉴别资料之精确,运用资料之恰当所叹服。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如此,他的许多诗学论文也是这样。凡师从程先生,学过校雠学的研究生,通常具有较为扎实的文献学功底,这已成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共同特色。

此外,他还想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无庸讳言,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仅程先生批评过的就有“见风使舵”、“以论带史”、“轻浮”、“弄虚作假”等不良倾向。为了克服学术界的不正之风,程先生一再指出:“实事求是仍然是我们应当提倡的学风”,呼吁“发扬实事求是学风”。我体会程先生长期坚持撰写和讲授《校雠广义》的目的,不仅在于让人们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而且还希望人们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操作规程。因为校雠学旨在求真,着重研究如何全面掌握与运用真实可靠的资料,所以他反对根据几个概念再加上几个例子就写成一篇文章,或者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十本书变成第十一本书的作法;反复强调“必须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他人引用的资料,必须核实”,注意辨别真伪、先后以及实证与推测的区别。他曾一再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你们写作业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处,都要有篇名、卷数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异文的,应该加以注明。这些,都

要求你们必须有一种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都应该十分注意。”

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程先生认为“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程先生特别重视后者,因为在程先生看来:“搞文艺理论的同志,一定要念作品。没有作品的话,理论从哪儿来?理论是从作品总结出经验来,又指导后来的作品的。如果搞空对空的导弹,理论有什么用处?”他本人研究古代文学坚持直接研究创作,从中抽象出诗人和作家的文学思想、艺术手段以及创作规律,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应当说这也是程先生提倡实事求是学风的一种反映,一个突出贡献。

程门求学记

今年3月初,我受学校派遣赴韩国讲学。行前,程先生、陶先生特意设宴饯行。4月16日,程先生还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其字迹如松枝竹节般苍劲有力,而行文一如既往,显得睿智、俏皮,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读罢会心一笑。6月5日星期一清晨,当我照常打开E-mail时,家人、系里与同事,都向我报道了程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我顿时呆坐桌前,默然无语,想不到上次一别,竟成了永诀。

记得1979年9月18日上午,莫砺锋、张三夕和我,第一次叩开了程先生的家门,望着程先生满头银发,不禁肃然起敬,从此我们便踏上了艰难而又快乐的求学之路。在首次谈话中,先生就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谈话结束时,还送给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次日,在中文系研究生师生见面座谈会上,除八字箴言外,程先生还要求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寂寞”。

程先生指导研究生非常注意传授治学方法,就在9月20日,也就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三天,他送给我们每个人一摞卡片,专门同我们谈了治学方法问题。为了培养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程先生除校雠学外,还开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他特地向赵国璋教授讨了三本《语文工具书使用法》送给我们。程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手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钻研目录学,校雠学的课程论文就是让我们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心得体会。为了让我

们少走弯路,他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专业文献选读书目》。程先生连我们的借书、买书问题都考虑到了,并专门同系资料室与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协商过。例如他在给我的一个条子中写道:“我已代你们在大馆借到《旧唐(书)》一至十册。我问过大馆人员,研究生每人可借十册。……”他还为我们代买了《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新英汉词典》等许多书,并且腰以包书纸。当时我们都很困难,无钱买书,他特地借给我们一百块钱,以便我们买书时周转。要写论文了,他还给我们一份《习作论文简例》,以及《校对符号及其用法》。对我们的论文,程先生都精批细改,使我们受益匪浅。例如我在论文中引用了《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程先生批曰:“此处应用《汉书》,凡是史料相同的,应尽量用最原始的,原始资料有不足处,则以后者补充或纠正之。”最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的还是每周一次的与程先生海阔天空的闲谈。程先生曾风趣地说:“剑桥大学的学问是在喝咖啡中得来的,我这里可没有咖啡招待。”每次闲谈都由程先生主讲,名人逸事、治学方法是经常涉及到的内容,比如刘永济先生每天起得很早,大声朗诵十三经等书;唐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徒步跑南京图书馆,风雨无阻;他和孙望先生得到刘国钧馆长的允许,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站着看书,抄资料;他说写论文要言必有据,好比盖房子块块砖头要落实;他说分析的语言要注意不可移动性。凡此种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快就研究生毕业了,毕业前,先生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佛学故事,寓意是他只给我们点了一盏指路灯,今后的路要靠我们自己走。由于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又曾协助程先生整理过《汪辟疆文集》;在先生的指导下主编过《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与先生合著过《校讎广义》,所以仍然不断地受到先生的教诲。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将许多有关文献学方面的书、杂志,甚至手抄手写的资料赠送